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一带一路”战略与 宗教对外交流

卓新平 蒋坚永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一带一路”战略与 宗教对外交流

卓新平 蒋坚永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卓新平, 蒋坚永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3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ISBN 978-7-5097-8844-8

I. ①一… II. ①卓… ②蒋… III. ①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宗教-关系-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127 ②B911 ③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300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 ·

“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

主 编 / 卓新平 蒋坚永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844-8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及其现实意义	卓新平 / 001
“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宗教对外交流新境界	陈宗荣 / 012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宗教因素的几点思考	郑筱筠 / 015
顺势而为、发挥优势 推进新时期中国宗教领域公共 外交工作	薛树琪 / 027
发挥宗教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刘金光 / 035
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与古代丝绸之路的新拓展	盖建民 / 040
宗教与现代性社会：排斥抑或共生？	闵 丽 / 049
“一带一路”与心灵沟通 ——论宗教交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吕建福 / 057
南海诸岛庙宇史迹及其变迁的考现学研究	陈进国 / 065
亚洲秩序与宗教信仰交往方式	李向平 / 121

谈“一带一路”上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与经济动力因素	圆 慈 / 142
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释增勤 / 148
丝绸之路与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释印乐 / 157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韩宗教文化交流	谢学谦 / 166
中国伊斯兰教对外交往活动能在“一带一路”战略国策中 发挥积极作用	金宏伟 / 173
试析伊斯兰文化中的经济动力	马光月 / 189
弘扬穆斯林优良传统 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王文杰 / 195
经文辩读在中国跨宗教对话的適切性	罗明嘉 / 203
从马丁·路德的政教关系学说来探索中国当代的宗教战略与 国家安全	黄保罗 / 212
基督教与汉代丝绸之路	江振鹏 / 227
宗教传播中的中国图像 ——鄂本笃修士的艰难旅程	谭立铸 / 247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基督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刘元龙 / 253
新丝绸之路上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省思	顾梦飞 / 257
“一带一路”与宗教团体的作为 ——以伊斯兰教为例	从思霖 / 267

圣经古亚文明中民本价值的寻回及其现今文明对话的实用价值	周贤正 / 272
“吉哈德”及其武装动员效应	侯宇翔 / 280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宗教文化建设	胡诚林 / 304
“文明互鉴”论与“一带一路”宗教文化战略	张二平 / 310
“一带一路”一世界：以罗兰·艾伦、爱德基金会与 香港圣公会为视角	魏克利 / 319
文化纽带 友谊桥梁 ——道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刍议	吉宏忠 / 331
“一带一路”的宗教战略选择	安 伦 / 340
在文化层面上进一步加强国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理解与认同	杨发明 / 345

“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及其现实意义^{*}

卓新平^{**}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使当代世界聚焦欧亚，重新关注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中外交通的路段以往曾有各种说法，在物质象征层面除了丝绸之外还涉及瓷器、茶叶、黄金、香料、珠宝、玉石等，较为流行的如瓷器之路、黄金之路、玉石之路等描述，国内还有茶马古道之说，而当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自19世纪70年代始用“丝绸之路”来表达古代中国通往西欧之路以来，这一表述因其形象、生动和较为准确而被普遍接受，从此成为定式并有更为宽泛的海陆之应用。其陆上丝绸之路与绿洲的关联，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碧波的相伴，都给人带来广阔而深远的联想与遐思。而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及人口比重自古以来也都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今天对“一带一路”的注目不可只是局限于政治、经济的视域，而更要有思想文化等精神层面的思考。这里，探究古今丝绸之路的意义，显然离不开其沿途存在及发展传播的宗教信仰。从丝绸之路与相关宗教的历史关系来看，悠久的丝绸之路充满了宗教之魂，呈现复杂的精神世界之图景，而且其灵性生活的积淀亦穿越尘封的历史而形成了对今天欧亚非巨大的现实影响。沿着丝绸之路的伸展，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宗教在其沿线的传播交流，感受到具有浓厚宗教意蕴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体会到这种宗教生活、精神信仰、神圣结社和灵性思维的鲜活及强大。宗教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其中既有文化交流、交融的善缘，亦有民族矛盾、文明冲突的苦果。所以，对

* 本文为笔者近来关于丝绸之路与宗教关系的多篇文章及会议发言综合而成，特此说明，请读者谅解。

** 卓新平，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于过去这种具有信仰侧重的民族共同体及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对其历史向近现代的延伸及当下影响,我们必须正确面对、高度重视。要想取得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真正成功,不能仅靠政治经济方面的努力,还需要研究其思想文化处境,关注其精神信仰的发展,而重中之重就是对其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和研究,要有客观、冷静的回溯,以确保我们今天积极、有为的展望。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专门探讨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犹太教,描述其与丝绸之路的古今关联,并对其现实意义及影响加以分析评估。

一 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

陆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历史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直接有关,而佛教则是在两千多年前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这种交流是中国与印度思想文化交流的真正开端,形成两大东方智慧的相遇及碰撞,中国于此才始知印度之名并“始闻浮屠之教”。中国把与西域关联的古代天竺称为“西方”,佛教经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乃中国最初了解的“西方宗教”,中国人去印度学习佛教故而也形成“西天取经”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等表述。当然,最初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来并非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有着复杂、辗转的传播经历,故使佛教传入中原经历了自印度至月氏、安息、西域之曲折演进。佛教入华最早的信史记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陈寿《三国志》卷30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说。随后在东汉永平七年(64)有蔡愔、秦景等人西行赴天竺,并于东汉永平十年(67)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弘法,而洛阳白马寺之建即根据“时白马负经而来”的这一历史。在东汉永平年间,“来华之天竺译经师,对印度之天象、书数、灵异都有涉及”^①。这样,中印文化交流才得以实质性开展。随后,有不少佛教高僧也经由西域丝绸之路来华传教,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13)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到长安被尊为国师。在此前后还有安息人安清、安玄、昙帝,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通过丝绸之路来华传教,成为当时著名高僧或翻译家。此后,海上丝绸之路也相应开通,印度佛教从

^① 李志夫编著《中西丝路文化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169页。

而也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如高僧真谛就是应梁武帝之邀而走海路于中大同元年（546）来到了南海（广州）。

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人得以走出去西求佛法。据传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中国僧人沿丝绸之路西往则始于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的西渡流沙，其“发自雍州至于阆”，取得梵文佛经正本带回。而东晋僧人法显（约377~约422）则从陆上丝绸之路西去，“发自西安、西度流沙”，后至中天竺，在外留学多年后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成为首位学成归国、循海而还的中国“海归”留学生。此间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走出去学佛，而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则被视为西行东归、弘佛译经的典范，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更是成为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原型，亦使人们对西天佛教耳熟能详。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的佛教交流，使海陆丝绸之路得以贯通，涵括北传、南传和藏传等佛教派系，并使其影响从与西域关联的印度扩大到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丝绸之路的过渡及连接。

通过佛教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社会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印文化交流乃中国人较为实质性接触或探究“西方”之始，在中西交往中印度实际上起到了二者之中转站的作用，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而认识古代印度，并由此得以最终认识到具有“西方”意义的欧洲。古代东方以印度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国度之一，早期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人文明及犍陀罗文明间接地与古希腊文明相关联，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曾使欧洲文化与印度文化有过非常直接的接触，此后来自欧洲的西人也多经过陆海丝绸之路而先到达印度，将之作为其修整、学习之地，以此达到其向东方其他地区扩散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目的。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期的西人东往有着奇特的呼应和共构，中古和近代西人的东来往往是经过在印度的穿行，其从南欧到印度果阿、再经日本终抵中国的航线依稀可辨。中国人不仅因佛教文化而认识了印度及印度宗教传统，而且也通过这一认识随着丝绸之路拓展到欧洲，中国人的古代西方观就是通过逐渐认识其沿途的“大食”“大秦”等而最终真正了解到西方。所以说，最早的丝绸之路为中印宗教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彼此认知。

虽然佛教后来在印度本土衰微，其沿海陆丝绸之路的外传却使佛教发展扩大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扎下了深厚的根

基,甚至还成为这些地区中一些国家的国教,如在南亚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就非常明显,形成了迄今仍有重要意义及影响的宗教文化与社会政治相交织的典型格局。可以说,佛教仍是今天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其多元文化存在和复杂社会功能对“一带一路”的开拓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这些国家或地区还因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之共存或对立而起伏,造成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而这恰是我们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所面对的地缘安全之挑战,就包括这些宗教及其影响。因此,了解研究这些地区佛教古今历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稳妥处理与这些佛教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乃是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有效前提和必要准备,是我们必做的文化学术功课。

二 丝绸之路与犹太教传播

犹太人与中国早有联系,流传着犹太人周代或汉代就已来中国的传说,而且这种历史渊源与丝绸之路亦密不可分。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犹太商人在唐代已经沿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这可以从丝绸之路沿线在新疆和敦煌所发现的6~8世纪的文物上得以印证。隋朝裴矩所著《西域图记》较早记载了中西交通的路线,其中描述了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①。犹太人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上都留下了其来华的印痕,他们使亚洲大陆东西两端都有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一般认为犹太人来华经商的路线包括海上两条和陆路两条:“一条海路取道红海,这是一条最古老的东西通道;另一条海路取道波斯湾。”“两条陆路中第一条是经起儿漫、信德、印度来中国。……另一条陆路经由可萨、河中而抵我国西北。”^②而全民信教的犹太人足迹所至也是犹太教所达之处。犹太人最早因丝绸之路而与中国结缘,大约在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由此而提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第1597页。

② 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载李景文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第232、233页。

供了犹太民族与中国交往之端的蛛丝马迹。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阿拉姆语词语 shirajin 表达“丝绸”，有犹太学者推测可能与汉语中“si”（丝）有关联。^①犹太人与中国的来往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今，形成中国与犹太民族的特殊关系。在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上所发现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基本上是7~14世纪之间的文物，这是犹太人在古代中国比较活跃的时期。而到了宋代，河南开封及江南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则已经有了较为确切的史料证明，此乃中国与犹太人历史交流中的热门话题。

中国人研究犹太文化一般会触及三个关键词，即“犹太”（民族、宗教之名），“以色列”（国名）和“希伯来”（语言名）；犹太教在华始称“一赐乐业”教，通常被解释为“以色列”的同音异译，但有中国学者断定此名是根据明太祖的旨意而定，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态度。^②中国古代民间则称其为“挑筋教”，其寺为“挑筋教礼拜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国学者都比较关注中国犹太人问题，其佼佼者陈垣指出：“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元史语解》易术忽为珠赫。……术忽或称主吾，又称主鹵。”“至于一赐乐业之名，则起于明中叶。如德亚之名，则见于明末清初。犹太之名，则见于清道光以后。术忽之名见于元。《元史译文证补》又谓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③根据陈垣等人的说法，至少自元代以来，关于犹太人之称就已经频频见诸中国文献，如相应于“犹太”的表述就有“术忽”“珠赫”“斡脱”等。在中外文化交流及融合历史上，犹太人及其宗教在中国有着颇为奇特的经历，充分体现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犹太人在华的早期历史乃“谜一般的历史”，很难彻底寻根追踪，但开封的犹太人的存在则是历史之明证，他们在宋代或是从古波斯沿丝绸之路东进，经过了西夏等“西域”国家，即来自“西域”，或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来华，即来自“天竺”，其海陆两路之踪迹仍然可辨。开封犹太教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记》称其“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而正德碑

① 参见张倩红等人未刊论文《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

② 孔宪易：《开封一赐乐业教殉沉》，《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2期。

③ 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84、85页。

刻《尊崇道经寺记》则说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解释说：“西域说就是波斯说，天竺说就是印度说。”^①这说明犹太教在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有过漫长的跋涉，经在其沿线各国如中亚、印度等地的留存、居住之后才最终来到中国。所以说，其来华交往不只是与中国人交往，沿途已经受到众多民族文化的熏陶浸染，因而其丝绸之路的经历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史话，而古代犹太人及其犹太教通过融合同化在中国的消失也引起人们的感慨，并使犹太人自己有着深刻的反思。犹太教经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文化相遇，并发展出犹太民族与中国的奇特经历和友好关系，由此犹太民族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好感，这种古代的美好印象还因“二战”期间中国收留犹太难民而谱下现代新章，形成今天中以友好的历史基础。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以色列总理还亲自出面参加感谢中国之宣传片的录制。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一经济、科技和文化大国对世界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其思想精神及宗教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流传广远，在中国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以交往频繁、合作密切，有着丰硕成果。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从中东现状来看，犹太教在民族宗教冲突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如何处理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上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迄今尚未有理想的解决办法，所以需要我们认真回溯历史，谨慎面对现状。

三 丝绸之路与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宗教之一，早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但其东来最初是以景教的身份，即已经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因其由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而来到中国，故而最初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经教”之称。此后固定下来的“景教”之名的意蕴也是指“光明之教”，“景”字在此与“火”“日”等古代波斯宗教的核心含义有着内在关联，也蕴含着中国文化对“火”及“光明”的理解。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流传影响到西域、中亚等地的历史文化，在沟通中西思想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可以说，唐朝景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典型的多元宗教文化的共同

^① 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48页。

体，它既代表着基督教与中亚琐罗亚斯德教及摩尼教的混合，也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与佛教、道教的最早对话和沟通，并在文献留存上成为敦煌文献的重要构成。

景教在经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后在唐会昌五年（845）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而遭禁止，但在丝绸之路的扩展地带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其影响甚至传到了西欧，它还一度成为西北部分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如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他们都曾以景教为其信仰。这种留存既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打下了基础，也使中古欧洲对远在东方的中国有着特别的期盼和关注。当西方“十字军东征”受挫之际，西欧曾流传东方有信奉景教的“长老约翰王”率军西征与穆斯林军队交战之说，这种传说成为西欧天主教派传教士沿丝绸之路东来的重要动因之一，相关记载散见于当时的《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所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等札记中，其历史记载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关于景教当时与丝绸之路其他相关宗教的接触、交融等猜想，认定“摩尼教、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与大乘佛教或西藏的某些宗教在历史上有联系”^①。因此，自元代以来，西欧因关注景教在中国沿丝绸之路的发展而开始与其对藏族及藏传佛教的探索相关联，这种历史积淀及学术习见迄今仍对西方社会及其民众有着深刻影响，对外关涉到中国同西欧、中亚的关系，对内则与涉藏问题关联，这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因此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天主教沿丝绸之路的东来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全面、系统了解，实质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意义。其元朝的东来代表着天主教真正传入中国之始，而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修会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的实践则开始了“西学东传、东学西渐”的时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成为西方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翘楚、开创西方汉学的先驱，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迄今让人叹为观止，因而不能否定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受耶稣会的启发而达到一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开始放眼世界、反思自我，并对西方历史、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等展开了全面研究。这种丝绸之路的连接及交

①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65～66页。

合使西方文化及其宗教进入中国，也让欧洲人获得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等知识，被中国思想文化所吸引，出现过欧洲的“中国热”。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基督教东传曾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互补，有着辉煌一时的“双赢”。但其文化差异及冲突而导致的“中国礼仪之争”也为此后的中西关系留下了阴影，由于丝绸之路从通途到阻隔，中西双方的关系陷入低谷，并形成了种种流传至今的误解和偏见，使中西文化与政治有了复杂的交织。今天丝绸之路的沿线虽然主要在亚洲，但其终端却已延至西欧，而欧洲思想文化又扩展为整个西方的基本思想文化底色，并影响到亚非众多地区及其文化，因此其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带来了如何智慧地与西方打交道的警醒，也是我们当前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通透之镜和扬长避短、求同存异以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宝贵资源。这里，丝绸之路上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应使我们有所叹息和感慨，值得今天认真回溯和反思，由此亦可提醒当今基督教世界尊重中国的发展，并理应理解和支持今日华夏大地基督教的“中国化”革新进程。

四 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教传播

伊斯兰教也是在唐朝经陆上即“安西入西域道”和海上即“广州通海夷道”这两条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在华曾有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门、清真教、天方教等称谓。古代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为大食，在永徽二年（651）随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到达长安，中国古代与大食交往之幕遂正式拉开。当时因商业往来而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贾沿丝绸之路在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穿行，不少人亦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得以在华生存和发展。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后来演变为长期侨寓的“住唐”，他们进而在华娶妻生子，从此发展出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的基本信仰。至元朝时，蒙古西征曾将所占之地的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形成“回回”的发展，并达“元时回回遍天下”之景观。

历史上伊斯兰教沿海陆丝绸之路的东传在华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如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其沿陆上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而在东南沿海地带的穆斯林则是源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伊斯兰教。这在今天也形成了鲜明的伊斯兰教地域地貌特色。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即今天中亚各国及中国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在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逐渐发展成为西域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宗教，并使之成为一条重要的宗教“信仰之路”，为今天中东、中亚的伊斯兰教化奠定了早期基础。当然也不可否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除了贸易和通婚的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即是政治权力和军事征服的扩张”^①。而东南亚各国伊斯兰教的兴盛及延至今天的巨大影响则要归功于伊斯兰教沿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传播，由此已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区域。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在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时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也曾使相关地区的伊斯兰教获得明显发展。

随着西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失败（1291），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尤其是东扩中先后建立起伊斯兰教的三大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其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1290~1922）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于1453年灭掉了原来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于16世纪占领了伊拉克地区。此前13世纪蒙古人西征，曾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使当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之状。但西征时留在当地的蒙古人也有许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如今在中亚东北高加索地区、车臣等地的鞑靼人，即源自这一历史传统。而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争斗中，波斯的萨非帝国于1502年建立，以什叶派为国教，并将此信仰延续下来，成为今天伊朗的最主要宗教教派；但其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巴布教派运动又从其内部分化出了巴哈伊教，该教因在波斯遭排斥而向外发展，形成遍布全球的当代新兴宗教。此外，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的莫卧儿帝国，也是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这样，在16世纪已完全形成伊斯兰世界奥斯曼、萨非和莫卧儿这三大帝国并存的地域“板块”，虽然这些“帝国”因近代西方的强势崛起和自身的分裂而随历史的烟云消散，退出世界政治的舞台，但其伊斯兰教的影响犹存，并形成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文化积淀和民众习俗。伊斯兰教因其发展中的多民族性、多教派性而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沉淀发酵，使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复杂而敏感，这是我们今天思考“一带一路”之地缘安全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如果不了解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复杂发展及其现状，则很难使我们具备风险管控和应对的能力。

^① 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3页。

从中国国内来看,与唐朝时早期穆斯林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不同,蒙古人的西进是以陆地丝绸之路为主,这就使得中国人与伊斯兰教有了深入的交往和复杂的融合,特别是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和融入中华文化带来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更为多元的发展变化,并逐渐形成了西域宗教的特色。伊斯兰教约于10世纪中叶前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其传播在新疆出现过两次高潮,先是在喀喇汗朝时期,然后是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这一过程使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当地历史上曾经流传的其他宗教而成为其最主要的宗教。而且,在喀喇汗朝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制手段来全面推行伊斯兰教,从此把伊斯兰教变成当地几乎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也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这使当地民众以往信奉佛教、摩尼教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也改变了新疆原有的宗教生态。16世纪时,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这是其今天宗教现状的历史缘由。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段历史加以深入研究,看到这种“古代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巨变,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所打下的独特烙印。由此我们方可认识其给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并准备好科学的应对预案。

当然,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发展绝非单向性的,其与中国文化的双向互动也颇为明显,而且卓有成效。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之道”启发了穆斯林“中道”思想的弘扬,而明清中国伊斯兰教也曾在其宗教“中国化”上取得过可贵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如刘智、王岱舆那样融贯中阿宗教文化的思想家、经学家,从而增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在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理应得到传承和发扬。我们在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伊斯兰世界交往时也要注意并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这种亲和力、感染力,使“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合作,同样也是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而推动的文化共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密切有关,其现实意义及影响不可低估。我们今天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注意和加强研究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把丝绸之路与宗教作为我们的重要课题和关注重点。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真实处境,在这一战略实施时必须要有相应的风险评估、应对及管控举措和机制。我们不可回避这些国家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通过政治、经济合作渗入

并影响到我国相关地区和民族这一现实。如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中亚北非各国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以及有些国家所保持着的一定程度的基督教信仰，这都会使“一带一路”成为开放的平台，有八面来风、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来自西方的影响。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有的是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其国教，有的是以某一宗教为其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从而会出现宗教主导社会走向，宗教影响甚至大过政治影响、宗教权威高过政治权威的情形。因此，当我们随“一带一路”战略而“走出去”时，不仅要关注境外复杂的民族、宗教状况，而且还要高度警惕这种境外影响的“倒灌”和朝我国的“流入”，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变预案及对策。我们既要把“一带一路”视为经济战略，更要明白其也是文化战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正确有方、游刃有余，以我为主，防范并减少宗教的负面影响，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和积极作用。